

江边的野花

□李晓

春天，江边的野花一簇簇灿然开放，江水奔流，思念奔流。

这是江边墓地的野花，它背靠苍翠青山，凝望着大江日夜奔流。花开了六十多年，香透了大江边的村庄。

墓地旁，星星点点的野花在草丛中眨着眼睛，那是一种母子间永远的时空相见。一处墓地旁的卑微野花，因为母亲的存在而显得高贵，因为守望而历久弥香。

这江边的墓地，是我堂伯的一个衣冠冢，他牺牲在枪林弹雨的朝鲜战场。1950年10月，年仅20岁的堂伯跨过鸭绿江，成为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，进入炮火弥漫的战场。堂伯的母亲、我的三奶奶，一个在旧时代裹过小脚的女人，从此常常一个人爬上村外的山冈，手搭凉篷眺望北方。

三奶奶再也没有等到儿子穿着军装风尘仆仆归来，等来的是堂伯英魂安葬朝鲜的消息。23岁的堂伯被敌人的炮弹击中，鲜血浸透了被炮火烤焦的土地，长眠在朝鲜新义州的志愿军烈士陵园里。

家里得到这个消息时，是1953年的秋天。为了不让三奶奶承受这份失子之痛，我的几个堂叔商量决定把这个消息一直封锁下去。在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，我的几个堂叔以堂伯的名义轮流给三奶奶写信报平安，并从邮局送到家里，按时给三奶奶读“儿子”的信。每一次“报平安”的来信，都让三奶奶热泪长流。为了掩饰得更好，几个堂叔还假装从部队汇款给三奶奶尽孝。

然而，到了1956年冬天，三奶奶从一个公社干部口中听到了那个撕心裂肺的消息。这个身材瘦小的女人，在泪水哭干之后，重新挺起了脊梁。三奶奶决定，在家门前的松树林里为儿子建一个坟。她把儿子生前留下的衣服小心地埋葬下去，为他建了一个衣冠冢。

这所衣冠冢与三奶奶的家门默默相望，与一个母亲揪心的目光默默相望。每一天，三奶奶都要迈动小脚，去儿子的坟前喃喃自语。她在坟前擦着老泪，她在坟前清理杂草，她在坟前等着夕阳下山去、炊烟升上来。

1959年国庆节，在堂伯的坟前，三奶奶等来了堂伯的几个战友。那一天，战友们把鲜花放在坟前，三奶奶一直拉着他们的手不愿意松开。战友们走后，三奶奶开始了一个人的行动，她要在儿子坟前种花、栽树，让野花和绿树陪伴地下长眠的儿子。

三奶奶在墓地前种下了油菜花、野牡丹、胡豆花，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。三奶奶去山坡上、稻田里找来花种与花苗，一锄一锄地挖，一棵一棵地栽。后来，她还栽下了李树、桃树、杏树、梨树。小小的墓地，从此有了满园野花开放、扑鼻的香气从墓地一直飘到村子里，香透了整个山村。特别是到了春天，山鸟和蝴蝶聚集在绿树与花丛中，鸟儿啾啾，蝴蝶翩飞，让坐在墓地旁的三奶奶开始浮现出安宁的笑容。

大江边有一所小学，学校校长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每逢清明与国庆，都要带着一群学生来到墓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学生们在墓地前献花，向英雄鞠躬，三奶奶在一旁微笑、落泪。

2002年春天，当地修建大型工程，三奶奶动员几个堂叔早地把墓地迁移到了村后山冈上。三奶奶特别交代，把那些能移走的树和花都移到墓前。这一年9月的一天，三奶奶去堂伯墓前坐了一会儿，回到家里，喝完一小碗菜羹之后，安静地走了。三奶奶活了91岁，她坚持活下来，是想在野花遍地的墓前多陪陪儿子。她静静地离去，也是去见分别了半个世纪的儿子。她的墓地，与儿子紧紧相邻。

墓地旁绽放的野花，饱蘸母爱的泪水，浸透母爱的温暖，以一种蓬勃的生机，焕发出大地之爱。这些遍布山冈的野花，尤为鲜艳和动人。



亦师亦友亦兄长

□鲁北

李秀鲁大哥走了有十年了吧？我时常想起他。

我在乡村小学当老师的时候，他在《农村开发报》工作。《农村开发报》是一份给全省农民办的报纸，有要闻、有新闻、有科普，也有副刊。我经常向《农村开发报》投稿。

那时候没有电脑网络，投稿靠信函。上世纪90年代，我写诗几乎疯狂，无论天空、大地还是庄稼、小草，在我眼里、在我笔下都是诗。我一次次把修改了无数遍的诗歌一笔笔誊写在方格纸上，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，投到绿色的邮筒里，然后是久久的等待。退稿或用稿，皆有可能，退稿是常态。

有一天，邮递员送来一个厚厚的信封，“农村开发报”五个红色大字映入我的眼帘，我急忙打开，是两张《农村开发报》。翻开报纸，急切地找自己的名字，片刻，在显著位置找到了。“是我写的诗！”我看到自己分行的文字变成铅字，欣喜若狂。仔细看，信封里还有编辑的一封信。那时候，退稿信大都是统一格式。但这封信不同，是手写的，首先肯定了我的诗歌，接着鼓励我继续投稿，末尾还有编辑的名字：李秀鲁。再投稿的时候，我在收件人地址的下面，工整地写上他的名字。我们时有书信来往，他鼓励我深入生活，发现生活之

“小气”的祖父

□林丹

记得我小时候，祖父在亲邻的口碑里，是一个寡言、小气、不好接近的人。祖父在我的心目中，也是一个寡言、小气、不好接近的人，尽管祖父的形象并不显得刻薄，一张方正的国字脸，一米七六的个子，在当时的湘南农村并不多见。他站在敞亮的堂屋中央，气宇轩昂，身材高大，与电影里的正面人物十分相似。

被父母接回县城上学，最后一次回老家探望完生病的祖母，我与父亲背起行囊要离开的时候，祖父背着双手，站在卧室门口，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们与躺在床上祖母道别。两家共用一个堂屋的爱春娘实在看不过眼，站在堂屋中间讥讽祖父：“孙子就要走了，你也不拿几角钱给他路上用，留着钱在屋里生崽吗？”祖父尴尬地望着我们微笑，身体却杵在那里一动不动……

那时的祖父不仅打得一手好豆腐，而且熬得一手好糖，林氏米花糖火候老到、入口香脆，在麻石街上的名声叫得很响。每年冬天，祖父总要熬上一锅热气腾腾的红薯或大米糖，再拌上几簸箕香气扑鼻的爆米花，冷却成型后切成三四指宽的米花糖。这便成了祖父换取活钱的副业、亲友往来的人情。

剩下的米花糖被祖父装在一个干燥的大石灰坛子里，一层一层仔仔细细地码放好。偶尔，祖父会像割肉一样拿给我一小块米花糖尝尝。石灰坛子稳稳当地立在祖父床头边的角落里，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挪不开的目光。

雪后初霁的早晨，明晃晃的阳光透过卧室的窗棂，耀眼地洒在床头边的石灰坛子上。我双眼一眨不眨地紧盯着石灰坛子，仿佛看见里面的米花糖一块块鲜活起来，争先恐后地在向我召唤。我使劲吞咽着嘴里泛起的口水，双腿不由自主地挪了过去，终于伸出手，胆战心惊地揭开了石灰坛子……

“啪”，一个响亮的耳光忽然落在我的脸上，半边脸火烧一样地疼痛，祖父不知什么时候气势汹汹站在了我的身后。祖母远远地望见了，惊呼着扑过来，像母鸡护小鸡一样，张开双臂将我紧紧护在怀里。“吃片米花糖有什么要紧？他还是个细伢子

美，多读书，写出人生大爱。他的叮嘱一直伴我前行，我们交往的那些年，他是我人生航线上的灯塔。他在《农村开发报》整版发表我的诗歌，加上编辑手记予以推介。这对于一个乡村小学教师来讲，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。他是我的老师。

有一年，我去济南找他，他请我吃饭，并让我住他家里。他知道，我一个民办教师，其实就是一个农民，也没有多少钱去住旅馆。善解人意的老大哥啊！那是一个赤日炎炎的夏天，热浪滚滚，无处藏身。当时他家里只有一台空调，安装在客厅里。那晚，他在客厅里铺上凉席，我们俩睡在客厅的地板上，说话到深夜。之后，我和妻子也去过他家。他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我的兄长。

多年来，我们写信、通电话，彼此熟稔。后来，《农村开发报》没有了，他有了新的工作。有一年，他因公干去邻县，绕道来看我，我给他安排县内最好的宾馆下榻，领他去街头巷尾吃当地名吃。当时，我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，不再是穷乡僻壤的民办教师，成了县级机关的一名国家干部。

前些年，去济南出差，或参加文学活动，也与他见过几次面，但不多。忽然有一天，我听说老兄因为急症，抢救无效，走了，还不到60岁，英年早逝。我伤心了很久。我把这噩耗告诉我妻子的时候，流出了眼泪，仿佛天塌了一半。

一个好人，就这样在世界上消失了。

哦……”祖母用手轻轻摩挲着我红肿的半边脸颊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往下掉。“有什么要紧？你讲得蛮轻松。再说做贼从偷针起，细伢子都是被你娇坏的……”祖父捡起地上的米花糖，鼓起腮帮子反复地吹了又吹，气鼓鼓地将米花糖放回坛子里。

雪后的麻石街一片狼籍，地上留着乡邻深浅不一的脚印。爱春踩着爹新做的一副锃亮的高跷，“哒哒哒”踏过肮脏的麻石街，趾高气扬地跨过我的面前。我羡慕地盯着她那副杉木做的新高跷，眼睛里蹿出的火苗几乎要将门前堆着的残雪融化。

祖父挑着一担沉甸甸的水桶，“吱呀吱呀”地从井边打水回来，站在门口瞟了一眼正踩着高跷玩得尽兴的爱春，又瞟了一眼肿着半边脸颊在一边羡慕不已的我，不易察觉地轻轻叹了一口气。不久，祖父戴着一顶棉帽，扎着一根腰带，蹬着一双套鞋，提着一把镰刀，默默地走出麻石街，默默地走过小石桥，向着远处白雪皑皑的岭上爬去，慢慢在我的眼前变成了一个小黑点。小黑点在岭上不停地移动，一会儿出现在雪地里，一会儿隐没在岩石间……我哈着冰凉的小手，踩着发木的小脚，双耳通红地站在麻石街的屋门口，望着街上的积雪一点一点在融化，我心里的积雪也一点一点在消融……

终于，祖父拖着一根砍掉枝丫的细杉木，在我望眼欲穿的等待中，眉毛染霜、一身寒气地跨进了堂屋里。砍削、钻孔、打磨、安装，一副崭新锃亮的杉木高跷静静地斜靠在堂屋的墙壁上。祖父收拾收拾地上的工具，扑打扑打身上的木屑，故意绕过我身边，欲说还休地张了张嘴，最终重重地咳嗽几声，兀自走进灶屋间，狼吞虎咽地吃起了桌上早已冷却的红薯。

若干年后的一个清明节，父亲在祖父的坟茔前，跟我讲起了祖父的往事，说他如何从一个一贫如洗的雇农，靠着自己的勤劳苦干，上武冈、邵阳贩猪仔，下全州、桂林贩盐巴，吃尽了人间的苦，受尽了人间的累，好不容易才攒起一点家底。“他实在是节俭惯了，你千万莫要怪他。”父亲凝视着祖父的坟茔，喉头突然有些发紧。那一刻，我的眼睛里有一种湿湿的东西在泛滥……

祖父生于1917年，卒于2001年。祖父，您在那边还好吗？